

(上接A27版)

父亲这个人不发脾气不骂人,但我一直很怕他

我算了一下,这一辈子和父亲在一起的时间,加起来不过四五年的时间。我对他的印象,也是断断续续的。他去世以后,这些断断续续的印象才一点点拼接起来。

父亲这个人非常自律,不喝酒,不抽烟,不打牌,除了看书,没什么其他嗜好。我们都叫他“标准钟”,他一般早晨5点半起床,散步半小时,然后开始看书,看到7点半,去上班。庐山会议后,他没有工作了,7点半会出去再散会儿步,回来接着看书,看到中午,吃过饭休息一会儿,再接着看书。晚上一般看书看到10点半,然后休息。有时候和他一起散步,他会一边走一边说起刚刚看到的植物、花鸟鱼虫什么的,他特别懂这些。

父亲这个人,不发脾气不骂人,喜怒不形于色,总是很平静,但我一直很怕他。小时候,我要调皮捣蛋了,老师会告状。父亲就会说:来来来,你坐下,我们两个谈一谈。听他这么说,我就很害怕。

那时候,我一直搞不清楚,他到底喜不喜欢我这个儿子。后来,听警卫员说,有时候晚上我睡着以后,他会来我的房间,站在床头盯着我看,一看看很久。我想,他还是喜欢我的。

1967年,我在新疆农场劳动时,认识了我爱人。我们结婚前,我写信给父母,告诉他们。他们给我邮寄了400块钱,还给我邮寄了被套什么的,是他们用旧的。后来,我们结婚用的新被子,还是我爱人她家寄来的。大女儿出生后,我就带着爱人和女儿去肇庆探亲,后来大女儿就留在了我父母身边。父亲也喜欢孩子,但他好像没有那种传统的观念。我大女儿出生后,他就说,一个孩子就够了。二女儿出生后,就一直跟着我和爱人。

父亲是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,我相信他的信仰,尊重他的信仰。不过,由于各种原因,我并没有入党。

我身边现在没有父亲的任何东西了。上海、齐齐哈尔、无锡、南京,都有父亲的纪念馆,我们把父亲留下的一些遗物捐了出去。后来出版画册《张闻天》,我们又把一些照片送了出去。我和父亲的合影本来就只有四五张,如今更是连一张也没有了。

父亲和母亲

我母亲是毛主席的老乡,她曾向主席写信“讨公道”

我母亲刘英,原名郑杰,是湖南长沙人。她1925年在长沙女子师范学校读书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。父亲和母亲是1929年认识的,当时母亲在苏联学习,父亲是她的老师。回国后,父亲和母亲都参加了长征。母亲是中央队秘书长,负责常委的生活、开会记录、文件传达等工作。在工作中,父亲看上了母亲。毛主席他们看出了父亲的心思,就撮合他和母亲结婚。1935年11月30日,他们在陕北瓦窑堡结婚,当时,父亲在瓦窑堡主持党的工作,毛主席在前线指挥打仗。12月,毛主席从前线回来,特地向父亲母亲贺喜,还戏称父亲“明君”,母亲“娘娘”。

我母亲是典型的湖南人,性格很开朗直率,在延安时和贺子珍等女干部关系都很融洽,和毛主席因为有老乡之谊,关系也很好。那时候,贺子珍和主席闹了别扭,常来找我母亲调解。主席和江青结婚后,两人

闹了别扭,江青也常常找我母亲来“告状”。

父亲和母亲结婚后,生活上的事情,都是母亲说了算,政治上,都听父亲的。比如,他们两个,一个吃得清淡,一个吃得辣,饭就各吃各的。家里的钱,一直是母亲掌管。但母亲也不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。在北京的时候,母亲想把公家的房子退了,买个四合院,父亲当时就火了,说你这是干什么。母亲也就不说话了。

父亲在庐山会议挨批后,大概是8月20日回到北京,他到家后,和母亲说起这件事。母亲说,你做外交工作,对经济问题何必多去讲呢。但父亲却说,脑子里有东西,不讲怎么行呢?母亲也就不多说了。不久后,受父亲的牵连,母亲被定为“右倾机会主义分子”。母亲想不通,就给主席写了一封信,大概意思是说:她和我父亲结婚,是主席介绍的;主席那时候说,张闻天这也好,那也好;可是现在怎么这也不好,那也不好。主席收到信后,在上面批示:“刘英的问题是否应与闻天的问题处理有所分别”。这样,母亲才免掉了“分子”,定为“严重右倾”。但是也离开了外交部,去了近代史研究所。她没搞过这方面的研究,其实只是个发工资的地方。

母亲跟着父亲受了不少苦,但两人关系一直很好。我后来听别人说,1968年,母亲和父亲被隔离审查后,关在两个房间,两人见不到面。母亲个子矮,洗不动大拖把,父亲就帮她把拖把洗干净,放在那里。后来到了肇庆,出门买菜什么的都是母亲去,父亲从来不沾钱。

父亲去世后,母亲调到了北京,担任中纪委委员。2002年8月26日,97岁的母亲在北京逝世。

父亲和他的女儿们

大姐是农民,二姐有文化,但被父亲精简掉后,一直是工人

父亲就我一个儿子,我2001年从南京大学图书馆退休,当时的职称是讲师。我那时候也想申请职称,母亲说,你去跟人家争什么?我就不申请了。退休后,我一直住在南京。我的大女儿一直跟着我父母,后来就在北京工作,小女儿一直在南京工作。

我还有两个同父异母的姐姐。我大姐从小就在上海老家务农,后来嫁了人,大姐夫是上海工具厂的工人,大姐就跟着他,到了城里,作为家属变成了“城里人”。现在,大姐已经去世了。

我二姐因为有文化,原来在外交部当打字员。1956年,政府精简人员,父亲那时是外交部第一副部长,他率先把我二姐精简了下去,让她回上海自谋生路。由于父亲把姐姐给精简掉了,所以当时外交部接下来的精简工作特别顺利。二姐回到上海后,靠着自己的能力在自行车厂找到了工作,还是做打字员。再后来,就以工人的身份退休了。

我还有个妹妹小倩,是父母在“三年困难时期”收养的。父亲那时候每个月有400块钱的工资,母亲是老革命,她的工资比邓妈妈(邓颖超)和蔡妈妈(蔡畅)低,但比大多数女同志都高,每个月有300多块。父母就我一个儿子,家里经济比较宽裕。父亲到各地考察,发现老百姓生活特别苦,他就提出收养一个孩子。他到山东考察时,从当地的孤儿院领养了一个孩子,也就是我的妹妹。

我们兄弟姐妹几个,年龄差距大,从小也不在一起。这些年,联系也很少。



1935年,张闻天和刘英在瓦窑堡结成终身伴侣。这是他们后来在延安的合影



张闻天和养女小倩在北京寓所



1975年,张闻天同长女维英(右)、二女引娣(左)在无锡合影。维英长期在农村,引娣是工人。



张闻天在肇庆期间,儿子虹生从新疆前来探望,这是他们在肇庆七星岩的合影。前排是儿子虹生和孙女冬燕。

链接

张闻天,1900年8月出生,上海浦东人。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,同年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、红色教授学院学习,1931年回国,后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,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、常委。1933年到达中央革命根据地,任中央政治局委员、中央书记处书记,1934年参加长征。

1935年1月,出席遵义会议,作批判“左”倾军事路线报告,支持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。会议推举张闻天为党中央总书记。1935年10月,到达陕北,继续主持中央日常工作,后又兼任中央宣传部部长。1935年12月,主持瓦窑堡会议,支持毛泽东同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,并起草会议决议。

1936年12月,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,并在发言中力主和平解决西安事变。1938年后,他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、书记处书记并兼任党中央宣传部长、马列学院院长等职,为推动全民抗战做了大量宣传和教育工作,并为党培养了一大批干部。1941年延安整风开始后,张闻天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到陕北、晋西北进行农村社会调查,写了多篇调查报告。

抗战胜利后,张闻天到东北做地方工作,先后担任中共合江省委书记、中共中央东北局常委兼组织部长等职。这期间,他写了《关于东北经济构成及经济建设基本方针的提纲》,对于新中国经济具有重要理论意义。

1950年以后,张闻天转到外交战线,先后担任驻苏大使和外交部常务副部长,参加了当时我国一系列重大外交活动,为新中国的外交事业做出了显著的成绩。1976年7月1日,张闻天病逝于江苏无锡。

据新华网、《张闻天年谱》《张闻天》